

情动理论导引^①

格里高利·塞格沃斯，梅利莎·格雷格 著，李婷文 译

摘要：文章阐明了情动的基本含义，对情动理论的两种传统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罗列了情动研究的八个主要领域并分别进行了介绍。情动理论与以往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关注多样的过程及其强度，偏向描述和计量，而不以判断和批评为主要方法或目标。由于关注中间性，情动理论具有“动情学”和“教育学”两种主要面相，也包含着希望与威胁及其相互转化的潜能。

关键词：情动理论；强度；动情学；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4-0020-10

假如情动根本就没有纯粹的或原初的状态，我们应该从何谈起？情动产生于中间性：产生于去行动和被施加行动的能力。情动是力量或强度的关系或过程（以及过程的持续）的暂时或更持久状态的冲击或挤压。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身体和身体之间（人类的、非人的、身体部分的，以及其他）传递的强度中，在循环于身体和世界周围、循环于身体与世界之间，或者粘附在身体和世界之上的回响中找到情动，同时也可以在这些强度和回响的过程或变奏中找到情动。最具拟人意义的情动是我们对那些力量的命名——那些潜藏的、伴随的，或一般来说意识不到的内在力量，那些强调情感的生命力量——它们可以促使我们去行动、去思想，并且去扩张，同样也可以将我们悬置在某种对力量关系的计量状态上（好像那是中立的一样），或者让我们被困在世界中寸步难行。实际上，情动持续地证明身体从来至少都是沉浸在和流连于世界的困顿和韵律、拒绝和邀请之中。

在很多方面情动都是力量或相遇的力量的同义词。但“力量”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太恰当，因为情动不必非得

是驱动性的（尽管就像在创伤的心理分析研究中一样，有时候它是驱动性的）。事实上，情动更像是在川流不息的强度最微妙的层面散发流转：所有未被察觉的细小的或分子的事件，普通的或超常的。情动产生于中间性并栖居于累积性的旁侧性（beside-ness）。情动可以被理解为某种身体能力的梯度——某种不断调试的力量关系中能屈能伸的渐进主义——这种梯度不仅随遭遇中各种各样的韵律和形态此起彼伏，也随感官和感受力的低谷与筛选作用而波动，这种渐进主义和各式各样行为举止的伴生物保持一致。因此，情动永远具有继续扩张的固有能力：在无机物和无生命物的裂隙，在细胞间能量、组织、内脏互相渗透的经济体系，在无形之物（事件、气氛、感情基调）蒸发幻灭过程进进出出。情动同时是亲密无间和非人的，它在联系和联系的中断里进行计量，成为“身体”（这里的身体不能被皮肤的外部包裹或其他表面的边界所界定，而是被它们在情动过程中往复运动或共同参与的潜力所界定）间传递的强度那潮起潮落中穿梭的力量——遭遇的重写本。它是捆绑和解绑、成为与不成为，刺耳的杂音和有韵律的

作者简介：格里高利·塞格沃斯，美国宾州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从事交流研究与戏剧研究；梅利莎·格雷格，任教于悉尼大学，从事性别与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李婷文，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从事现象学美学、政治哲学研究。

① 本文为格里高利·塞格沃斯（Gregory J. Seigworth）、梅利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编著的《情动理论读本》前言《微光盘点》（An Inventory of Shimmers）的选译。原文见 Gregory J. Seigworth, Melissa Gregg, "An Inventory of Shimmers" in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5.

调音。情动标志着身体属于一个遭遇的世界; 或者世界属于一个遭遇的身体, 并且在非附属的情况下, 情动通过所有那些悲哀得多的互相共存性的构成(瓦解) 来标记。总是会有含混的或“混杂的”遭遇在冲击和喷薄中变得更坏或更好, 但(更常见的) 是中间状态。^①

在这种持续累积的力量关系中(或者相反, 在积淀的剥落和消逝中) 存在着情动的真实力量, 即情动作为潜力: 身体去情动(to affect) 和被情动(to be affected) 的能力。在过程中被与各种各样的混杂力量的遭遇所标记的身体, 到底是怎样将它的情动(被情动) 转化为行动(去情动的能力) 的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他早期的研究中曾经主张, 情动并不怎么反思或思考; 情动只行动。^{[1]357-359}然而弗洛伊德也相信情动的过程与思想活动有持续的毗连关系: 二者非常靠近, 以至于感知的触须不断地在无意识的(更准确来说应该是非意识的) 情动和有意识的思想之间扩张。而在实践中, 情动和认知永远不会完全分开——不为别的, 就为了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具身化的身体。情动因其中间性而向未来敞开, 它对于身体不断的成为(becoming) 总是必不可少(尽管很微妙, 但身体比起它已然所是的样子, 总是在不断变化)。由于身体和遭遇的力量有联系, 实际上身体本身就是由遭遇的力量构成的, 身体也被这种联系牵引, 超出它表面上的界限。就这样, 身体借助情动既入乎自身之内又出乎自身之外——以它的联系织网——直到明确的区隔终于不再有意义。^②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在他广为引用的情动论述中说道“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身体可以做什么。”^{[2]87} 这里有两个关键方面值得马上强调或者再次强

调: 首先, 身体的能力永远不会被单一的身体所界定, 而总是会被身体力量关系的领域或情境所辅助和支持, 并与这个领域或情境吻合; 其次, “认知身体”的“未完成性”与当今的相关性要远远大于 330 年前斯宾诺莎写完他的《伦理学》之后那个历史时期。但正像斯宾诺莎所意识到的那样,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对“身体”(任何身体) 的一般考量, 而是一种极具特殊性的努力, 旨在配置一个身体和它的情动/被情动、它正在进行的对世界的情动构成, 以及世界和身体的此性。

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都试图以它们各自的方式聚焦身体情动行为或撤销情动行为的“未完成性”。每篇文章都展示了它们各自对于遭遇力量和强度过程的考量, 这些过程虽然碰巧看起来很单薄, 但与附属于世界的显著而彻底的非人层面(甚至是亚人和前人层面) 相吻合。^③ 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未完成”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挑战, 强调了将情动的事物和过程转变为伦理的、美学的, 以及政治的课题的紧迫性。当然, 斯宾诺莎应该也明白, 我们绝不能设想情动的“未完成”会有一个终极解答。没有人会最终总结“所以, 那就是答案: 现在我们明白了所有身体可以做的事情! 让我们纪念这一天!”这一斯宾诺莎式的使命就要被“未完成的”情动行为认知所取代, 从而促使情动——以及促使那些试图探索情动构形力量的理论——走向下一个、下一个, 再下一个力量的遭遇。

但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未完成”和它们的“下一个”看作迈向着统一步伐的前进过程, 就更严重地误解了当代情动理论。并没有单一和普遍的情动理论: 它现在没有, (还好) 以后也不会有。如果真有什么, 更引人遐想的也应该

① 德勒兹-马苏米一派的情动理论家强调过程的重要性, 要求读者把世间万物理解为运动, 而把运动理解为持续不断的过程, 而不是理解为物体的位移。马苏米借用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的运动观, 以射箭为例, 展示了箭的飞行运动那远比从起点到终点的位移丰富得多的穿透空气的强度、飞行轨迹的无限潜能, 以及飞行过程本身的中间状态。而这种以过程和运动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是德勒兹-马苏米一派情动理论的根基。(见布莱恩·马苏米《虚拟的寓言: 运动、情感、感觉》, 严蓓雯,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第6页)。——译注

② 由于德勒兹-马苏米一派情动理论家倾向于把世间万物理解为运动和过程, 所以有固定形态的“身体”没有被看作一个不变的静止的实体, 而是被看作一系列运动变化在时一地的偶然形态, 身体本身是变动不居、没有边界的。我们所看到的身体实体只是运动变化产生的暂时效果。“网”的意象也经常出现在德勒兹-马苏米的理论文本中, 如德勒兹在分析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时就把叙事机制比喻为一张蛛网, 而符号构成了每根能够传导感觉的粘线。叙事者就是织网的蜘蛛, 它在蛛网中感觉和活动时不像人类一样使用五感, 而是被网所受到的波动所驱动, 靠这些有强度的波来定位和行动。(见吉尔·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 姜宇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 第171-183页)。——译注

③ 如本论集中收录的文章《说出不可说: 情动、身体管理与心理健康服务的用户》就尝试把人、其他生物和事物放在一个连续的光谱上, 从量的区别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区别, 并使这种视角有利于患者经验的表达和保健系统的修缮, 避免退回人道主义的传统。——译注

是无限多样往复的情动与情动理论:情动理论是多样的,尤其应该被看作它们自身与身体、情动、世界的特殊遭遇。(理论——任何大写的或非大写的理论——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工作的吗?以其方法论活力谦逊地阐述观点,而不是将自己像一个可拆卸网格式的阐释模具一样强加在摇摆不定的世界上?)^①但这样一种事态可能需要努力解释,为什么第一次遭遇情动理论时,我们会感觉到一种瞬间的(有时候是持久的)方法论或概念的自由落体。几乎所有久经沙场的依据和立足点都不可避免变得不可靠和不可预测(严格意义上的“决定”概念或直接的因果链也被扫地出门),它们曾是批判性—文化—哲学探讨和理论的依据与立足点,包括主体/客体、表征与意义、理性、意识、时间与空间、内/外、人/非人、身份、结构、背景/前景,以及其他的理论。^②由于情动不是产生于某种辩证的、对相反要素或原始单位的利落整合,而是产生于黏答答的亲密无间的关联,它就使简单的区隔主义对临界点、张力、混合物以及模糊让步。就像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最熟悉的探究模式不是从静态而是从动态起步,不是从站立场而是从永远在路上的过程起步,情动理论就不会那么像自由落体。

这也不奇怪,当理论竟敢对情动进行一种尝试性的探索,它们有时就会被看作幼稚或浪漫的天马行空,闯入由世界或身体的无数相互牵扯构成的无界之地,以致迷失于乱花障眼的差异:追逐萤火虫般渺小的强度,在平铺直泻的光天化日之下追逐黑夜中微弱的闪光,记录那些微颤的震动,将浮光掠影下的东西凸显出来(有的并没有说服力,应该叫做过度凸显)。但我们的撰稿人会让我们看到,情动以冲击或喷薄的方式从属于世界、从属于身体,以及在情动的内在特征上从属于世界和身体的中间性,这同样预示着情动理论的前途:照亮身体所作所为的“未完成性”,在呼之欲出的未来图景中画出希望的一笔(虽然也是忧心忡忡的一笔),将情动对世界具有无限联系的、非

人的、极具感染力的从属关系指示出来。

所以情动理论到底可以做什么?毫无疑问,人们对各式各样情动宣言/情动理论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大量涌现的论文和论著(比如本书)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同时情动也作为会议、特刊和座谈会等的主题出现。但要把这些多样的情动流行现象干净地整合到一个画面里好像不大可能。并没有一条坚定不移的主线可以完全展开或环绕情动及其特殊点,更毋宁整合它的理论:它的线索九曲回环,或许有一些有迹或无迹可寻的交叉点,一些难以预测的论点的交集,它们还没被阐明、被巩固或被推翻。“情动”概念在特定的探索领域以多变的步伐和时效畅游,也会掠过那些最稳固的学科边界(比如,神经学和建筑在情动上的接口这样的边界),它逐渐积累了一种摧枯拉朽的分类法,要对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支柱、批评语汇,以及本体论路径进行扫荡,所以可以被(也已经被)推广到所有形式的政治/实用/成就目标上。或许对于情动和它的理论化,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他们会作为过程的过剩溢出正在进行的过程,也会溢出它们产生的语境。

无疑最近一次对情动及其理论的兴趣暴涨是在 1995 年,是由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的——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和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的文章《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和布莱恩·马苏米的文章《情动的自治》。不仅这两篇文章的理论内容令人神清气爽(将情动取代认知的核心地位和情动理论取代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辩论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声音和写作的风格——情动充当了力量和形式——也促进了这两篇文章广泛的流传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两篇 1995 年的文章连同他们的作者接着发表的相关文章,为人文学科情动研究的两条路线确定了基本的方向:西尔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关于不同情感的生物心理学(1962)(塞吉维克和弗兰克)以及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身体能力的斯宾诺莎式行为学(1988a)(马苏米)。从汤姆金

① 约翰·劳的《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是目前我们能想到的最值得一读,在方法论上也很混乱的文本。此处所谓的网格式阐释模具所指向的还是强调位置和位移,而不是过程与运动的模型。有了网格才能明白无误地指出位置,把运动固定在网的各个点上。——译注

② 这里指的是,以往的文化批评理论都以判断或批判为目标或者方法,以揭露意识形态机制为主要特征,但情动转向的文化理论中无论是汤姆金斯-塞吉维克一派,还是德勒兹-马苏米一派都没有延续这种传统。马苏米甚至批评了这种总在纠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先有个人还是先有集体的传统文化批评倾向和困境,转而关注描述性、中间性的价值,要求读者不要急于下判断。(见布莱恩·马苏米,《虚拟的寓言:运动、情感、感觉》,严蓓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 88-112 页)。——译注

斯的路线,情感沿着一条准-达尔文主义的“先天主义”道路来关注进化出来的本能。这些先天因素既没有完全孤立也不以脑或肉身为终点;反之,它们进行了燃烧和消耗,刚好可以转换那些由社会关系的氛围性辐射所承载的影响。同时,德勒兹的斯宾诺莎式进路把情动置于事物和关系(内在性)中间,从而进一步把情动放置在同时构成身体和世界的复杂集成之中。这些探询的线索中因而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逆流——某种方向上外翻/内卷的差异:情动作为原初“兴趣”的促发者开始将力量变为身体力量(汤姆金斯);情动作为包含着无数种成为人和非人可能性的完整、富有生机的调试领域(德勒兹)。虽然不应该假想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完全整合这两条情动理论的路线,但这两条路线可以在特定的点上相互穿透和呼应[尤其注意这卷书中吉布斯(Anna Gibbs)、普洛宾(Elspeth Probyn)和沃特金斯(Megan Watkins)的作品]。

但情动的理论化远远不止两个角度。当下(而且仅在当下)我们试着用一系列简略而模糊的快照来列出八个方向,它们波动不定而且有时候在考虑情动问题时还会重叠。每一个探究的领域——出于方便的目的,并没有特定顺序——都展示了一系列有微小差异的思考,通常体现在它们的前提或目标上,或两者兼有。

第一种路径有时出现在紧密交织的人类/非人天性的古老而神秘的实践中,包括现象学和后现象学关于具身性的讨论,他们还探讨身体在支架和延伸方面的假体能力[薇薇安·索伯查克(Vivian Sobchack)、唐·伊德、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劳拉·马科斯(Laura Marks)、马克·汉森(Mark Hansen)等]^①。

第二种路径和第一种相交织:他们关注更晚近更不神秘(虽然有更多资助)的人类/机器/无机物的集成,比如控制论、神经科学(研究物质、研究能动性分配、研究情感/感官等)、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生物信息/生物工程学(生命技术越来越多地染指生命和非生命间的情动联系)。

第三种路径出现在某种非人主义的、往往是地下的、非笛卡尔的哲学传统中,通常把物质的运动联系于无形的过程(斯宾诺莎主义):我们尤其可以在当代哲学中找到这些努力逾越各种性别和文化限制的尝试。比如女性主义[罗西·布莱多提(Rosi Braidotti)、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吉纳维芙·劳埃德·莫伊拉·加腾斯]、或意大利自治主义[保罗·维诺(Paolo Virno)、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或哲学路径的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urence Grossberg)、米迦汗·莫里斯(Meaghan Morris)、布莱恩·马苏米],或政治哲学[乔治·阿甘本(George Agamben)、迈克尔·哈克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尼格里(Antonio Negri)]的作品。

第四种路径出现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些路线里,当涉及主体间和客体间社会欲望系统中正在发生的冲击和压力时,某种相对来说不加掩饰的生物主义还是保持着具有共同创造力的开放性[早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西尔文·汤姆金斯、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米凯尔·博尔西-雅格布森(Mikkel Borch-Jacobsen)等]。虽然这种倾向更想给情动一个正式的种类名称,也想给情动确定一个适合操作的特定范围,有更人类中心的终极目标,但它跟第三种路径还是很相似。

第五种路径出现在那些通常强调见微知著的政治研究里——或许常常是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残疾人运动、规范性权力下的底层关切——他们关注坚硬持久的物质性和转瞬即逝的蜉蝣,关注平时和工作日,关注日常和夜常生活,关注“经验”(这里的“经验”不是在个人和内在的意义上理解,而是在更集体性和“外在”的意义上理解)。在这些场景中持续的、重复的权力实践可以同时塑造一个有缺陷也有潜力去实现一个世界的身体(更准确来说是集体的身体),这个世界在规范的视域和边界内外得以维持。

第六种路径出现在各种企图反转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语言学转向”的尝试(通常是和人文相联系)中——从

^① 比如美国海德格尔现象学派的代表胡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就试图用“熟练应对”(skillful coping)的框架来解释运动和更一般的人类活动,并使之与人工智能研究相结合,探索机器与环境的互动能力、仿生机器自身的感知能力等。德雷福斯、伊德等人的观点和英美主流的经验—分析哲学框架中的心灵哲学及其表征主义相左。德雷福斯“熟练应对”的观点就受到心灵哲学的重要代表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批评,塞尔认为运动中包含着基本的意向和统筹,否则无法解释职业球员在比赛中的临场规划和司机驾驶时的自主纠错现象,而德雷福斯的观点被他称为僵尸(zombie)观点。(见休伯特·德雷福斯《对约翰·塞尔的回应》,成素梅译,《哲学分析》2015(5),第20-31页。约翰·塞尔《现象学的局限》,成素梅、赵峰芳译,《哲学分析》2015(5),第4-19页)。——译注

文化人类学到地理学,到交流与文化研究,到表演艺术实践,到文学理论——经常触及那些逐渐被量子理论、神经学以及认知科学影响的作品,尤其是触及到被不平衡物理学所影响的作品(见前述第二种路径);这种倾向也要求回到和激活语言学转向之前或同时期的作品及其伴随的社会建构主义倾向。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例子: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第三人称意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非感官拟态、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的“开放的环境”,以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理论等。这一情动理论转向有时关注前/超/平行语言“外部”领域如何跟“低等的”或相邻的感官(比如摸、尝、闻、韵律和动觉,或在另类/终极意义上自主的神经系统)相交的问题,同时也主张一种对于社会和文化更宽泛的定义。这些作品更多关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情动遭遇的伦理—美学方面。比如,这些情动遭遇包括和技术诱惑、婴儿、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语言艺术(尤其是建筑)、动物(伙伴或非伙伴)等的遭遇。

第七种路径出现在对情感的批评话语(及情感史)中。这些批评话语逐渐抛弃了内在化的自我或主体性(因而沿着第三种路径来问,如何在“后”我思的时代思考和感受?),以开启表现性的疆域,它更多地与共鸣的世界以及感觉/热情的漫射相联系——常常包括社会氛围、大众行为、感觉的传染、依附的事物[比如,近来对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兴趣回潮]以及一系列后殖民、杂种化和移民声音,它们对某一场景和环境中具有自我衍生的能动性和纯为私有的情感的个人化行动者的特权和稳定性进行了有力质疑^①。在不把主体和客体的空间一位置当作首要条件的情况下,情感——接受了决定性的情动品质之后——可以怎样被重新考虑?^[3]

第八种路径出现在科学和科学研究本身的实践中,尤其是那些拥护物质主义多元论的实践[常见于阿尔弗雷德·诺尔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被重新关注的文本]。因此科学实践绝不会致力于抹消惊奇或本体论相关性这件破布烂衫,而是相反,像伊莎贝尔·斯腾格

斯(Isabelle Stengers)所说的那样,科学实践“让世俗世界的错综复杂和一片狼藉凸显出来,变得栩栩如生并有意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我们的观念以及权力关系现在没有,以前从不,将来也绝不会孤单”^[4]。情动在这里是一个铰链,它让变幻不定的事物与惊奇(有时也与厌世的恐惧密切地搅和在一起)永不停歇地相互揉合。

再次声明一下,以上并不是对当代情动理论已经和尚未实现的或想象中的融合与分歧的完美概括。肯定会有更多情动理论;毫无疑问也确实还有更多情动理论——只要其他思考关联能力的探索方式被创造出来,这些关联能力从属于身体的行动或被引发身体行动的世界从属性召唤出来。一个人既然已经对这些层面进行过充分涉猎,就只需要考虑那些具有丰富智识和政治意义的作品(可能并不总是援引情动或情动理论,但还是从中学到了什么),比如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艾林·曼宁(Erin Manning)、威廉·康纳利(William Connolly)、J.K.吉布森-格拉汉姆(J.K. Gibson-Graham)、丽莎·布莱克曼(Lisa Blackman)、约翰·普罗特维(John Protevi)、西恩娜·恩盖(Siane Ngai)、加桑·哈吉(Ghassan Hage)、简·班内特(Jane Bennett)、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斯蒂芬·夏维洛(Steven Shaviro)、伊丽莎白·威尔森(Elizabeth Wilson)、阿方索·灵吉斯(Alphonso Lingis),以及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眼下这八个情动研究方向提供了一个足够有用的素描框架,我们可以挑出个把本书撰稿人文章中与此相呼应的关键点来说一说。

如果说本卷中的单篇文章是临时收集起来的,那么正是在情动绽放空间各自探索物质性的过程中,它们整体彰显出一种启示性的努力。雷蒙德·威廉斯把永远“跨越一个又一个‘物质主义’”^{[5] 122}认定为必要的批评任务,这和伊莎贝尔·斯腾格斯的话语不谋而合。这个毗连但无形的绽放空间的情动品质在我们的撰稿人这里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体现的:作为过剩、作为自治、作为非人、作为难以言喻、作为过程的过程性、作为教育—审美、作为虚拟、

① 这种探索倾向可以在马苏米对几个著名实验的挪用和阐释中找到先例,在《情动的自治》中,马苏米就从雪人调查实验、“丢失的半秒”实验推演出情动对于意识和意义的优先性,并以语障患者观看里根总统的视频实验为契机引申到美国的里根文化现象,尝试从感觉传染的角度阐释“里根现象”和更一般化的总统现象中的大众行为。(见布莱恩·马苏米,《虚拟的寓言:运动、情感、感觉》,严蓓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28-58页)。——译注

作为可共享的(拟态)、作为粘附、作为集体、作为偶然性、作为临界点或汇合点、作为潜能的内在性(未来性)、作为开放、作为包围着陈词滥调和传统领域的动荡不协调性,以及作为容纳倾向的聚集地。以上的每个形态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把情动的“未完成性”说成它的“承诺”——沙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本·安德森(Ben Anderson),以及劳伦·勃兰特(Laren Berlant)(对勃兰特来说,应该是“一系列承诺”)最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而其他撰稿人只是暗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祖尔纳兹(Zournazi)的(作为承诺的“希望”观点里找到补充性视角]

同时,情动的这一承诺及其继而对情动理论支撑产生的需求也必须认识到,认知不足的未完成性不会得到终极的或最后的保障——无论是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教育学的,还是其他的——情动和去情动的能力并不会圈定下一个全新的、实际的、总会比现在更好的领域。这些看似饱含希望的时刻也完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讨论“被接受的”现代性和另类的、共存的现代性时强调了这种事态,布莱恩·马苏米在考量情动诞生的未来所包含的“威胁”时,帕特西亚·克劳夫(Patricia Clough)在分析资本与物质的情动能力的勾连时,都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在过程物质主义的情动绽放空间里,情动理论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最大压力是这样的问题:“情动究竟是希望还是威胁?”毫无疑问,任何答案都往往同时包含这两方面(因此勃兰特才有“残酷的乐观主义”一说)。

我们有时候会很想相信,情动在我们身上有很多投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魔幻般地带来更美好的明天,仿佛情动总是已经和进步的或解放的政治缝在一起,或者至少也是和我们善意(best angels)的精髓缝在一起;仿佛情动总能创造更好的存在状态和附属品——与此相反,情动其实带有一种紧张而彻底的内在中立性。可能这就是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他倒数第二个讲义选集《中立》里

呼吁的原因之一,“一种能够察觉到情动最小值和情感显微碎片的亢奋意识……这意味着把情动时刻的瞬息万变,某种急剧的变化看作微光”^{[6]101}。对于巴尔特来说,中立绝不意味着默许、政治中立,或陷入灰色地带的同义词;简单来说,它并不意味着某种对于当下和现状年深日久的冷漠。相反,通过指涉“紧张、强烈和未曾预料的状态”,中立促进了对对立和否定“范式的展示”,以避免简单的极化和冲突思维,同时也避免中立性(作为“如火如荼的行动”)想要去消解的那种意义的偶然和解^{[6]7}。同样,中立不局限于有形的/有条有理的空间时间因素,也与结构主义的条框圭臬没有关系,它“只是中场休息,只是两个时刻、两个空间或对象之间的关系”^{①[6]146-147}。在这些中介或热闹非凡的中场休息里,强度持续地暴露在世界或身体交错渐进的补充关系里——梯度在这里是一种“强度层面上(关注度、速度)对刺激物(气味和光亮的梯度)或对行为习惯(目标的梯度)时间或空间的渐进的强调”^{[6]196}。巴尔特提出,分析不会再以结构主义的二元方式(“是/否”),它们的滑动、倒错,以及回旋的方式继续下去,而是必须代之以“加/减”的形式,来“用一个很少为人注意的形式计量:这就是描绘(stretching)模式”^{[6]196-197}。于是去考虑强度的渐进式强调(加/减),那种变亮的微光,就成了重要的事:是对当下过程的描绘,而不是立场。^②

从这种描绘中,中立就支持了巴尔特想要铸造一种伦理或“‘横向选择’的话语”的企图,或者就像他接下来说的,这一路径赋予他“某种自由探寻的方式,探寻怎样将我自己的风格呈现于我时代的挣扎之中”^{[6]8}。巴尔特主张,紧随其后的批评实践应该是一种有中立变化的内在的动情(pathos),或者说是一种盘点“微光、细微差别、状态和(情感)改变”的动情学(patho-logy)^③。动情学会关注这些因素怎样聚集成“情动、感受力和感情”并促发“差异的热情”^{[6]77}。一方面,情动理论在这里是一种“微光盘点”,

① 这种中立性和前面提到的两个论述相联系——一是情动理论关注运动本身,而不只是位移,并且把位置看作运动偶然的产物;二是情动理论不急于下判断和揭露意识形态,而是更耐心和专注于描述与计量,关注连续量变的过程。——译注

② 如塞吉维克和弗兰克就通过援引汤姆金斯强调文化理论进行范式转型的可能性,不再局限于是/否、开/关的解释和批判模式,而转向捕捉更多样现象及其强度的计量和描述模式。在说明几种基本情绪时,“神经元放电”虽是情绪的开端和计量的开始,是一种开/关模式,但根据放电程度和变化方式却发展出几种在性质上相互区别的基本情绪。对“羞耻”情绪的考察不再局限于文化批判,而是转向其生成和建构的积极作用及其过程。(见 Eve Kosofsky Sedgwick, Adam Frank, “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Critical Inquiry*, Vol.21, No.2 (Winter, 1995), pp.496-522.)——译注

③ pathos 一般指哀婉动人的情感或语句,而 pathology 的一般含义是“病理学”,这里作者借助相同词根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本文将分开的 patho-logy 翻译为“动情学”。——译注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情动构成(在“构成”这个词的一系列意义上——既有本体论的构形意义又有普通意义上作家创作的意义)。这是一种对差异作为持续的、闪闪发光的强度渐进的热情。去盘点每一个特殊个体。与中场休息对应的则是描绘:开启一种(对“未完成性”的)动情学。^①

在一次会议上,当要求每个人写下“身体”的反义词时——尽管没有提到罗兰·巴尔特——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也发现了这种他称之为“对身体的动情学定义”的东西。在所有的反义词中(除了那些“可以预料的和显然在开玩笑的‘反身体’或‘没有人’(nobody)”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不受情动的”和“死亡”^{[7]205}。他总结道“如果身体存在的反面是死亡(并且)没有生命可以独立于身体……(那么)拥有身体就是去学习被情动,意味着‘被动’(effectuated)、被移动、被其他实体推动起来,无论是人还是非人。如果你没有投入这项学习之中,你就会变得不敏感、变得迟钝,你就会慢慢死去”^{[7]205}。身体作为有界限的物质或永恒的本质的意义减弱了,但它“作为界面越学习被更多元素所情动就越可以被描述”的意义增强了。^{[7]205}讽刺的是,当巴尔特把情动强度的斜度说成“渐进式强调”,从而大致暗示了一个人将怎样在与气味和光亮梯度的日常遭遇中指认这些近乎不察的情动的时候,拉图尔在字面意义上挑了气味的例子来解释身体怎样变得被动。在扩展论述时,拉图尔特别考虑了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只鼻子”(怎样在香水工业中训练鼻子来工作)。

就像人们可能想象的那样,拉图尔接着描绘的是嗅觉科学、香水工业、鼻子主体、嗅觉分子的化学构成、气味的名字以及训练周期等事物极端的共同扩展和相互穿透的现象。由始至终并没有对主体/客体的清晰描绘,在努力成为一只鼻子的过程中并没有理所当然存在的内/外世界。在梯度调整的计量中,人们会发现身体的能力和有时几乎是无限细分的差异是同时产生的:通过把情动转化为不断精细化的姿态或行为习惯来滋养差异,直到只剩下在表达中表达的世界:这些表达仅仅作为感觉的间隙或仅仅作为对感觉间隙的描绘,(在顺利表达时)逐渐创造了对差异的热情,而身体的动情学和情动世界的教育学在此交

汇。事实上,这也许就是这一“中立的”绽放空间所能提供的东西:身体的动情学和情动世界的教育学的交叉。正像本论集收录的本·海默尔(Ben Highmore)关于味觉的文章末尾所暗示的,这就是“生活中通过实验来转型的精神气质。政治在这里是一种经验教育学的形式,它持续不断地把你的感觉中枢暴露在新的感官领域之中,你的精神气质让你在其中坐立难安。这里存在着希望……”

虽然情动理论有多重轨迹,但我们坚持认为它应该持续地催生或邀请“动情学”进行个案举例——不仅仅是盘点(虽然有时候这也够了),也要以促进身体成为更接地气 and 更敏感的界面为目标,以向我们时代的挣扎展示风格为目标,来推进一种生产性的教育学。或者正像劳伦·勃兰特在她文章中讨论人们轻轻掠过规范性乐观主义的残酷时所说的那样,“用蔓延的愉悦来取代习惯性的冷漠将会怎样带来一个迎向另类生活伦理的契机,或者怎样不会”。也许这就是情动理论的“未完成性”“对当下”的承诺,它根深蒂固有条不紊(或近似有条不紊)的行事方式:努力找到对绽放空间的描绘(或闯入)可以一蹴而就而不是循序渐进地实现什么的幸运时刻。假如可以那样就好了。情动的承诺有:行动力的增加(情动力的扩张:去情动和被情动的能力)、开始“变得有能力”^{[8]51}、身体与世界亲和性的共鸣,以及对更多生命或生命本身的敞开。^[9]或者以上都不会实现。正如劳伦·勃兰特在本卷收录的论文中所说,也存在着拖延和逐渐钝化的下滑运动,即便是幸运时刻也“可能适得其反……情动氛围的转变不等于改变世界”(斜体为引言作者加)。

因此相反地,情动也可以成为强大威胁的一个主要的内在指标。布莱恩·马苏米在本卷中的论文里说道“要理解威胁的政治本体论必须要转过头想想情动的过渡带……那个晦暗不明、熙熙攘攘的地带。”晦暗不明的区域带有最粗犷而具有潜力的冷漠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它等同于中立。在威胁的政治本体论的条件下,我们看到教育学的世界和动情学的身体陷入了僵局,或许他们情动/被情动的力量开始偃旗息鼓。悬置、枯竭,或者死亡。^②但这一

① 西恩娜·恩盖在她的论著《丑陋的情感》绪论中讨论了保罗·维诺谈到的情感态度的和情感倾向“中立要点”,她的观点在这里非常适用。她稍晚讨论的“炫耀行为的熄火或悬置时刻仍属于情动范畴”的观点也同样适用。

② 我们这里所考虑的主要是阿甘本的《开放》中讨论雅各布·冯·乌克维尔(Jakob von Uexkül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罗斯托克蜱虫(Rostock tick)的中间章节(见 Ge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9-70.)。

分野——希望或威胁——鲜少截然分明。以帕特西亚·克劳夫的论点为例——本文集中最无所畏惧的一篇论文——对希望或威胁的分野“往往”截然分明而不是“鲜少”截然分明的多种情况进行了思考——她考察了生物介质所真实包含的“生命本身”以及“生物政治语境下最高杀害权”中的“生命本身”。尽管如此,克劳夫找到了一个契机,一个小小的“未完成性”。或许中立的事物总是可以被渲染得充满希望。它必须那样(毕竟情动是用祈使的语气来说话的)。因此虽然感觉像是精工填海,但克劳夫在文章结尾写道“总会有获得其他的、始料未及的全新事物的机会。”谁不愿相信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总是在难以预料的绝处逢生中重构自己呢?

通过中间状态混杂的能力,随着情动的扩张与收缩此起彼伏、殊途同归或平分秋色,有什么出现了,过剩了,溢出了:那是一种关系的形式,就像韵律、褶皱、配速、习惯、轮廓,或者是某种标记着从身体到身体/世界一身体的鳞次栉比的强度过程的形状(无论是减弱还是增强)。^①正是这种毗邻和持续的关系性——像安娜·吉布斯在她收录于本选集的论文中所展示的那样,常常通过模拟来起作用——持续围绕着聚集在五彩斑斓、远不止是人类的集体中的情动和身体。这就是大部分情动理论广泛共享的地形学,贯穿它们进行盘点的无数方法(这里需要考虑诸如梅根·沃特金斯的文章,她讨论了教育学理论和情动积累为“性情倾向”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自己散漫的动情学。正是通过这些形状、配速、韵律、褶皱以及轮廓的持续性指标(durational indices),本文集的撰稿人得以开始命名(实际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称)以过程为导向的物质主义的独特的情动绽放空间。

因此在理论中,在韵律和角度研究中,情动“是什么”的问题常常让位于“怎么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情动理论不在步步为营的理论建构上花费力气,而是最操心展示(presentation)和展示的风格以及被展示的风格。沙拉·艾哈迈德的文章之所以能在本论集中打头阵,是因为她对幸福之“偶然性”(被她称为“乱七八糟的经验”中

的偶然性或潜力)的关注正是进入中立的绽放空间的不二法门,情动理论永远蒸蒸日上又充满张力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她写道,“我们会走进一个房间并‘感受到里面的气氛’,但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取决于我们切入的角度。或者说,气氛总是已经有了角度;我们总是在特定的位置感受它。教育学的遭遇充满了各种角度。”这是几乎所有的情动理论都引以为基础的审美变形的时刻。如本·海默尔在他的论文中所说,这并不是那种既进行道德说教又对过程的结果沾沾自喜的美学“主导模式”,而是一种情动主导的美学,它对“过程的过程性那混乱的未完成状态”感兴趣。究竟该如何走进一个特定的房间,突然间感受到这个绽放空间早已存在的角度呢?如何寻找一种表达的方式来构造一种个别美学,以同时把握过程的描述和当时当下内在固有的实用性呢?以及如何记录写作中差异的强度,但又不至于把这种差异转化为可被感受和分享的差异呢?埃尔斯贝斯·普洛宾通过援引塞吉维克和弗兰克受汤姆金斯启发的文章,指出“对于情动,一般的招揽不起作用。假如我们想要激活这些概念,我们就必须了解清楚不同级别的不同情动。有一点需要强调:不同的情动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写作、思考以及行动”。这一对情动和美学的专注是“形式”大于内容“并非是什么,而是如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情动,以及如何被他物情动”。^[10]因此,情动美学的“如何”成为连接“未完成性”和“下一个”的一种方式。仅就当下而言是这样,还没有更多保障。

情动的政治方面一般通过它的美学来推进,或者和美学并驾齐驱,即一种身体能力的伦理—美学,它促使我们对世界的“形式”敏感:去发现(或不去发现)协奏的韵律那一蹴而就的新颖或改变,同时保持和频频闪光(闪烁/消逝、熠熠生辉/暗淡无光)的连续体的密切联系,这一连续体贯穿“如何去情动”和“如何被情动”之间狭窄的中间地带。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一样,在分析澳大利亚的“红船”难民事件(Australia's "red ship" refugee event)产生的政治利害关系时,洛内·伯特尔森(Lone Bertelsen)和安德鲁

① 我们这里谈的是劳伦·勃兰特的文章《爱,一种酷儿情感》。她认为我们可能“把爱的形式不仅看作规范和机制,而且看作一个持续性指标”。勃兰特写道,“我把它看作一种刺青,韵律、形状、配速。是你所创造的碰触和声音的环境,然后你就可以一再返回。思考这些爱的品质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亲密关系的某些更一般、更中立、更非人的特质……”(见 Lauren Berlant, "Love a Queer Feeling", in *Homosexuality/Psycho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432-451.) 又见塞格沃斯对诸如激活电路和情动调协这些持续性指数的讨论。(见 Gregorg Seigworth. "Fashioning a Stave, or, Singing Life" in *Animations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3: 75-105.)

• 墨菲(Andrew Murphie)为情动理论简洁地例示了伦理—美学范式及其后果。它首先是一种盘点的双重策略(“无限的情动小事件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持续的动情学(新“感官疆域”的发展)。伯特尔森和墨菲主要从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作品中得到灵感,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经验教育学“如其所是地发展一种对生活模式富有创造力的责任。”这就是他们援引“节制”所要提倡的开放式行为习惯,以及这种“节制”以政治为导向所收集的在不纯粹人道主义(过于人性和总是大于人性的)意义上的集体或从属性中存在的生活模式:那是一种有活力的对待生命的态度,同时还有其当下性和“未完成性”。

同样意义上的情动与不纯粹的人道主义——过于人性和大于人性的考量交汇的地方——指引着斯蒂芬·布朗(Steven Brown)和伊安·塔克(Ian Tucker)去研究精神病医患关系的管理与常规下的心理行为医疗。通过情动理论,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必倒退回人道主义,也能表达患者经验和保健系统复杂性的方式。布朗和塔克认为,情动给予他们“一种连续不断的格式塔转换,前景与背景、经验与装置在其中对调……关注情动可以让我们提出,人和生物及其他事物的差异是量的,它们在数量和经验的复杂程度上有所区别,这些经验通过人体可以承载的特殊联系和方式紧张地相互交叉”。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持续的格式塔转换”在描述身体的动情学和情动世界(它们相互构成一种韵律、轮廓、形状和配速)的教育学之交叉时,是一种很好的措辞。

安娜·吉布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种格式塔转换,认为它是一种“双重性,使两种视角的波动成为必然……那种策略性的人道主义审视着表征的镜片,关注文化可塑性和主体形式在历史中的嬗变……而‘外来的’、非主体的生成的世界中这些存在样式只作为其他运动转瞬即逝的轨迹而存在”。在寻找前景和背景以交感或拟态韵律的形式波动的持续性指标时,某种五彩斑斓的大于人类的集体(作为装置)和经验的多重层次(作为具身主体性)一起闪烁着微光。因此,当布朗和塔克稍后提出“中介观念”的概念时,他们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这个观点,以从中窥视不可言喻之物的情动方面,并提炼出一个审慎的个

案,这个个案适合安放在难解难分的“怎样去情动”与“怎样被情动”之间狭窄的中间地带里(尽管任何病人—身体—世界的单子都充满了各种角度)。情动对于像剂量的美学或艺术这样的经验层面也有启示:那就是实验与经验。感受身体与世界界面的角度和韵律。

布朗和塔克仔细而审慎地把“怎样”情动缝合到精神科病人和学科器材的共同生产中去,奈杰尔·斯利夫特(Nigel Thrift)在他的文章中则是直接把“怎样”情动抽取出来,而这显然是该理论胆大妄为的一面。斯利夫特描述了几近无止境增长的世界中的世界、世界上的世界,以及主体性越来越疏离(公共亲密性)的特征,并对潜在的反潮流以及通过“人类—非人类魅力领域的建立”得到释放的动能抱有热情。这一点并没有那么突兀,这些 21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审美品质让人尤其联想到克劳夫对当代生物媒介和生物政治纠葛的挖掘——“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和非物质,它们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认为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像物一样,我们认为无生命的东西也可能会有生命的标志”。克劳夫追随情动的纹理来到深埋于“生命自身”脉冲中发挥作用的生物政治与生物科学的培养基,而斯利夫特与此不同,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化”中急迫的表面展示(eager surface-display)上既已存在的所有方面。斯利夫特看来,在新的经验环境(既是真实的又是理想的)极具传染性的生产中,有一种不断增强的折射,“每一个表面都相互联通”,在过程中生产出“新的文化神经,如果你高兴这么认为的话,这些文化神经塑造了‘你’另外的面相。”斯利夫特回避了那些直接批判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和操控生活世界的第一反应,他转而去想这些“情动领域相互重叠”的方式可能可以为美学与政治调试这种反向实践提供场地^①。他明白,这是一种将世界化的情动绽放空间转化为中立的横向描绘,并导向当下和未完成的动情学希望(与威胁)的韵律(和方法):这种希望是,下一系列的遭遇以及我们遭遇的“方式”将永远可以带来更多遭遇。

这可能也确保情动理论会提供一些确定性:本·安德森主张,情动“在文化理论的视野中具有不断延宕的希望”,这一视野并没有“稳固的根基或过多的外在”,但提

① 斯利夫特的研究发展出“中立性”非批判面相的另一实践意义,即看到资本主义文化神经生产的过程并不一定就完全跟极权主义和操控天然合拍,其中也有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周旋、反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潜能。正是这种“中立的横向描绘”方式把过去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化为游戏和竞争的场地,也使希望和威胁具有相互转化的潜能。——译注

供了身体/身体化及世界(化)的中间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物质主义的中立偏侧优势。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情动难解难分的希望与困境就是在身体行为的动情学及与世界闪光的教育学遭遇中被撬开并/或被重置的。

【参考文献】

- [1] FREUD S.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M]. London: Hogarth, 1966.
- [2] SPINOZA B. Ethics; On the correction of understanding [M].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59.
- [3] TERADA R. Feeling in Theory: Emo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 STENGERS I. Diderot's egg: Divorcing materialism from eliminativism [J]. Radical Philosophy, 2004, 144: 7-15.
- [5] WILLIAMS R.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6] BARTHES R. The neutral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LATOUR B. How to talk about the body?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science studies [J]. Body and Society, 2004, 2(3): 205-229.
- [8] AGAMBEN G.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9] MASSUMI B.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0] SHAVIRO S. Pulses of emotion: Whitehead's critique of pure Feeling [EB/OL]. (2007-07-01). <http://www.shaviro.com>.

[责任编辑 林雪漫]

An Introduction to Affect Theory

Gregory J. Seigworth, Melissa Gregg, Trans. LI Tingw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Affect, and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two traditions of the affect theory. On this basis, it lists the eight main areas of emotional research and introduces them separately.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ffect theory and the previous cultural studies lies in its focus on diverse processes and their intensity, with emphasis on description and measurement rather than judgment and criticism as the main method or goal. Because of the concern for the intermediate nature, the affect theory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otional science" and "pedagogy", and also contains the potential of hope and threat and their mutu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affect theory; intensity; emotional science; pedagogy